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中

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A History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1898-1949)

主编 谢天振 查明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I209.6
X46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点项目



郑州大学 *04010246609W*

主编 谢天振 查明建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1898—1949)

主要撰写者（按章节顺序）

谢天振 查明建
陈建华 姚君伟
许光华 卫茂平
宋炳辉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I209.6
X46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 / 谢天振 查明建主编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ISBN 7-81095-003-7

I. 中… II. ①谢…②查… III. 文学—翻译—历史—中国—现代 IV. I 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2049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高玲玲

印 刷: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 1/25 字数 545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7-81095-003-7 / I · 000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总 论

上 编

第一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滥觞	29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文学翻译活动	29
第二节 早期的翻译机构和翻译刊物	40
第二章 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先驱	45
第一节 梁启超	45
第二节 严 复	49
第三节 林 纾	55
第四节 苏曼殊、马君武等翻译家	60
第三章 “五四”与 20 年代的翻译活动	69
第一节 新青年社的翻译活动	69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的翻译活动	72
第三节 创造社的翻译活动	74
第四节 未名社的翻译活动	77
第四章 新文学作家的翻译活动	81
第一节 鲁迅与周作人的翻译活动	81
第二节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	87
第三节 茅盾的翻译活动	89
第四节 巴金的翻译活动	91

第五章 三四十年代的文学翻译	94
第一节 瞿秋白与“左联”的翻译活动	94
第二节 上海“孤岛”时期的翻译活动	98
第三节 国统区的翻译活动	101
第四节 《译文》《世界文库》与时代出版社的贡献	105

下 编

第六章 俄苏文学的翻译.....	115
第一节 概述	115
第二节 主要作家及其译作	139
普希金 莱蒙托夫 果戈理 屠格涅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 契诃夫 高尔基	
第七章 英美文学的翻译.....	219
第一节 概述	219
第二节 主要作家及其译作	269
莎士比亚 拜伦 雪莱 狄更斯 哈代 王尔德 惠特曼 杰克·伦敦 辛克莱 奥尼尔 赛珍珠	
第八章 法国及法语国家文学的翻译.....	374
第一节 概述	374
第二节 主要作家及其译作	399
巴尔扎克 雨果 左拉 司汤达 卢梭 莫泊桑 罗曼·罗兰 梅特林克	
第九章 德国及德语国家文学的翻译.....	449
第一节 概述	449
第二节 主要作家及其译作	478
歌德 海涅 尼采 苏德曼 席勒 施托姆 施尼茨勒 霍普特曼 雷马克	
第十章 东欧及北欧国家文学的翻译.....	510

第一节	概述	510
第二节	主要作家及其译作	551
	显克维支 裴多菲 邓南遮 安徒生 塞万提斯	
	易卜生 斯特林堡	
第十一章	亚洲诸国文学的翻译	574
第一节	概述	574
第二节	主要作家及其译作	592
	芥川龙之介 泰戈尔	
附录 1	主要人名索引	602
附录 2	主要书名索引	633
后记		667

总 论

一、翻译文学的界定

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文学的概念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即将翻译文学等同于外国文学。这种认识形成的深层原因,就是认为文学翻译只是语言层面的纯技术性的符码转换,其实质还是外国文学。这实际上就将复杂的文学翻译活动简单化,模糊了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在民族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翻译家的文学贡献也从而在这种模糊的认识中被忽视了。

文学翻译的性质决定了翻译文学的性质,因此,要认识翻译文学的性质首先需要明确文学翻译的性质。

文学翻译是一种审美再创造活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只是文学翻译的外在行为方式,其本质与文学创作一样,都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相对于原作而言,文学翻译是依据原作的一种审美再创造。译者根据原作者所创造的意象、意境、艺术风格等等,通过自己的解读、体会、认知水平和表达能力再度传达出来。

虽然从理论上说,好的译作应“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达到“化境”,但“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①在文学翻译中,译本对原作的忠实永远只是相对的。即使是公认的杰出译作,也只是以本民

^① 钱钟书:《林纾的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268页。

族文学审美标准在审美效果上做出的价值评判。译作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而难以真正成为原作的替代品。

文学翻译不同于非文学翻译。非文学范畴的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宗教等著作的翻译,译者如能将原作中的理论、观点、学说、思想准确忠实地传达了出来就达到了目的。但文学翻译则不然。文学翻译不仅要传达原作内容的基本信息,而且还要传达原作的审美意蕴,“诗无达诂”。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审美信息和文化意蕴也越丰富,译者对它的理解和传达也就难以穷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因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同样,一代也有一代之翻译文学。文学作品的解读常常受到解读者自身文化环境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制约。不同时代的读者对同一部外国作品也会有不同的解读。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初始中国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篡权夺位的阴谋家失败的故事,而现在人们从作品中认识到的,是人性的复杂性和人性中阴暗的一面;“五四”时期将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作家有着不同内涵的作品都以“为人生”的模式进行阐释;《红与黑》众多译本的出现,说明新的文化语境激起了人们对作为艺术人物的于连形象以及社会生活中的于连现象饶有兴趣的思考和多元化的阐释。其他如奥尼尔剧作、《飘》、《红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作品的复译,也都潜含着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读者(包括译者)对作品的新的认识。除因语言水平以及因语言障碍无法完全传达原作的精神内涵、而不可能做到译作与原作完全对等和忠实外,文学翻译中还存在大量因文化差异和译入语文化系统诸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对原作有意的背叛。

文学翻译是一种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行为。两种不同文化的遇合际会,必然经历碰撞、协商、消化、妥协、接受等等过程。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经过他解读、价值评判、改造、变通等文化协商的结果——译作,已不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除外在形态异化为译入语语言外,译作还会因

适应译入语文化生态环境而出现变形、增删、扭曲等等,从而打上了译入语文化的烙印,负载着译入语时代文化的意蕴,所以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指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①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而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则反映出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译者的民族文化身份使他的翻译活动以本民族文化、文学为价值取向,对原作忠实与否很大程度上都是决定于译者的文化意图。

接受美学创始人沃夫冈·伊塞尔认为,每一个作家的创作都有其隐含的读者。英国文艺理论家特雷·伊格尔顿解释说:“接受是作品自身的构成部分,每部文学作品的构成都出于对其潜在的读者的意识,都包含着它所写给的人的形象……作品的每一种姿态里都含蓄地暗示着它所期待的那种接受者。”^②作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者,译者也有他的隐含的读者,译者为了充分实现其翻译的价值,使译作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得到认同,他在翻译的选择和翻译过程中就必须关注隐含读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视野。任何译者对外国文学的择取受两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他所处的文学文化语境和个人的审美倾向。对任何一位译者,这两个因素常常交互发生作用。其个人的审美倾向不可能脱离其文学意识赖以生成的文学土壤——文学传统和时代文学风尚。一旦译者个人的审美倾向与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群体期待视野发生冲突,译者往往舍弃个人的美学追求而以主流文化的需求为价值取向。既然以本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为旨归,一旦原作与译入语文化语境在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方面发生矛盾冲突,译者就会自觉不自觉地背

^①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②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05页。

离原作进行“文化重写”。译者有时为了更加接近预期读者的道德的、文化的、文学的等等期待视野而有意无意的“误译”，以赢得读者对译作的认同。如清末蟠溪子、包天笑翻译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删去了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吴趼人为《毒蛇圈》增添女儿思父以强化孝道的内容；傅东华译《飘》，人名地名悉数中国化，并略去原作中的情景和心理描写文字不译。实际上，任何文学翻译都在不同程度、不同的层面上有意无意地存在着创造性的叛逆现象。

德国翻译理论家汉斯·弗美尔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行为，既然任何行为都有一定的目的，那么文学翻译也有其目的，译者最为关注的是目的能否达到。^① 弗美尔的“目的论”虽然还只是关注翻译方式，如“翻译”、“意译”、“编译”与翻译目的的关系，没有在文化层面上对翻译现象做出更深入的探讨，但他揭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常常被忽视的事实：任何翻译都是受一定的文化、文学意图所操纵。以“忠实”为目标的翻译标准只是具体翻译上的追求，而无法解释复杂的翻译现象，更不能作为翻译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导。如果原文不符合或不尽符合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该怎么办？弗美尔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成为不可能，而只能改写。实际上这种特殊形式的翻译——“改写”——在 20 世纪中国翻译史上并不鲜见。苏曼殊、陈独秀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译名为《惨世界》），形式上采取传统小说的章回体。从第八回起，整整有六回的篇幅是译者凭空添加的情节，编造了一个与原著完全不相干的情节。小说借人物之口，多处责备“奴隶的支那人”的丑恶习俗，并以反对拿破仑称帝独裁为结尾，借此来宣传自己反满的民族革命的思想；梁启超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删改了与

^① 参见 Hans J. Vermeer, *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自己政治观点不符的攻击清政府的文字；^①文革期间内部发行的刊物《摘译》刊译的苏联剧作《金色的篝火》，译本为了突出翻译的目的，在译文中直接插入批判性文字^②等等，这些翻译现象都更加显豁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特征。

如果说以上所说的现象是译者作为第一时间的外国文学接受者自觉的个人化的创造性叛逆，那么如果译者的认识与译入语读者群体的意识形态不尽吻合，作品又要经受接受环境的再次创造性叛逆。如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其在英国文学语境中的政治讽刺意义就荡然无存，而只是有趣的冒险故事，成为少儿读物。文革时期的翻译文学更是遭到有意的曲解。美国 E. 西格尔的爱情小说《爱情故事》被解读成美国青年向“垄断资产阶级”投降的故事；《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被认为“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哲学”，“适应了反动资产阶级的需要”。^③ 这虽是特殊年代比较极端的事例，但其体现的接受者和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现象却是比较普遍的。文学作品的复译，除旧译本语言老化原因外，也征示着对作品有了一种新的阐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的处理以及他撰写的译本序跋之类的文字，征示了时代的阅读风气和文学视野的变化。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所指出的，“翻译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的参照系里（指语言）”，“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④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充分说明，文学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上的转换。文学翻译也不是单纯的个人审美行为，而是

① 参见王宏志《“专欲发表区区政见”——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参见《摘译》1976年第8期。

③ 《一份向垄断资产阶级投降的号召书》，《海鸥为什么走了红运？》，载《美国小说两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④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39页。

在特定民族文化时空中的文化创造行为。文学翻译从翻译选择到翻译方式,从对作品的阐释到译作文学影响效果实现的大小,都受到本民族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影响和制约。

无论是语言差异而导致译作不可能等同于原作,还是由于文学翻译过程中种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而出现的创造性叛逆现象,译作都不可能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从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来说,译作是原作的“第二次生命”形态,^①是它的新的存在形式;从译作与译入语文学关系来说,译作是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一部新的文学作品,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审美特性和文化内涵。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性质决定了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人们常常说的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指翻译文学。翻译文学以独特的文学面貌,融入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与创作文学一起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学的时空,因此,它们理应在民族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位置。

二、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

关于翻译文学的定位或者说其归属问题,长期以来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专章,将翻译文学纳入中国文学史中,视为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重要一环。但 1949 年以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就没有了翻译文学的专门章节位置,即使涉及外国文学的影响部分,也是轻描淡写,或者只提俄苏文学的影响。建国后影响较大的两本文学史著作——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和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未将翻译文学作为专章论述,

^① 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王美华、于沛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年,第 139 页。

在具体论述时也很少提及外国文学的影响,即使提及也更多强调俄苏文学的影响。较之后出的文学史著作,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绪论”中,还是谈到了外国文学对新文学发生的影响作用,并认为,“五四”新文学“吸收了进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经验与方法,而加以应用和民族化,这是五四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世界的来源”^①。

翻译文学从中国文学史上消失有多方面的原因。建国后文学界片面地强调文学的民族性,为了突出强调中国气派、民族风格,文学史连原来所认同的外国文学在“源”与“流”辩证关系中的“流”的地位也逐渐被淡化掉。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意识形态日趋左倾,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起到重要影响作用的翻译文学都被视为封、资、修之列,文学史论著对此更是噤若寒蝉。与片面强调“源”的一面相关的,就是存在着对影响概念的模糊认识,以为一谈“影响”就会抹杀“源”的重要性,遮蔽“民族性”和民族文学的创造性。实际上,如果没有民族文学主体性的接受意向和文学需求,影响也就不会发生。中国文学史不提翻译文学,回避外国文学的影响,对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发生原因的分析 and 阐释就不可能全面真实。

如果我们从20世纪的文化语境的角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坐标系中,追寻翻译文学发展的踪迹,就能清楚地看出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也就能充分认识到翻译文学在民族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从文学翻译的价值取向来看,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和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社会责任感,使得中国新文学创作逐渐以现实主义为价值取向。在文学翻译方面,“五四”时期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界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罗曼主义(现代主义)文学的翻译逐渐转向以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文学的翻

^①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9页。

译为中心。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和压榨,东、北欧弱小民族文学中反映出的被损害民族的痛苦自然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而俄罗斯、被损害民族文学以及英、法、德等国家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能直接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起到鼓舞和启迪作用。文学翻译经过第一个十年多元化选择后,也越来越表现出对外国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视。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的左翼文艺运动和民族危亡的时代意识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取向,30年代开始的抗日战争和苏联文学的传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价值取向,并影响了以后的文学翻译择取,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基本走向和特征。文学翻译的选择与时代的主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对辛克莱译介的巨大热情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文坛除报刊刊译外,翻译出版了辛克莱作品达30余种,其中有些再版、重印了多次。郭沫若一人就翻译了《石炭王》、《屠场》、《煤油》三部。辛克莱的作品并没有很强的文学性,其文学声誉并不是很高,之所以在红色30年代获得了这样高的文学地位,还是因为其作品中的革命话语契合了时代的需求,被认为表现了“时代精神”,而时代的文学观念认为“没有时代精神的作品是没有伟大性的”^①。

翻译文学直接参与了时代文学主题的建构,与创作文学形成互动、互文关系。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就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以文学为纯艺术的艺术我们应是不承认的。……

^① 麦克昂(郭沫若):《桌子的跳舞》,载《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6月,第99页。

所以介绍时的选择是第一应值得注意的。”^①而瞿秋白 1920 年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中对文学翻译的目的和要求提得更直接和明确：“我们决不愿意空标一个写实主义或象征主义、新理想主义来提倡外国文学，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我们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的文学才介绍。”^②“五四”时期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翻译；30 年代的革命文学，如高尔基、辛克莱等人作品的翻译；抗战时期一批反战文学的翻译；三四十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都成为特定时代的注脚。更有一些外国作品被改编为话剧形式，进行“中国化”改造。如田汉 1936 年改编的《复活》，针对当时中国正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背景，突出原作中并不起眼的几个波兰革命者的形象，让他们唱出祖国被敌侵占的悲痛；1941 年 12 月，重庆公演了根据《天边外》改编的《遥望》，剧情以中国抗战为背景，剧中人物与情节全部被“中国化”。等等这些事例都说明，翻译文学的发展是以时代文学主题为旨归的。

翻译与创作的密切关系还有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一身兼二任，创作与翻译并重，相互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主要作家都翻译过外国文学作品，如鲁迅、胡适、郭沫若、周作人、茅盾、巴金、曹禺、徐志摩、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等。他们的翻译与创作构成了他们文学生涯的整体，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创作内容，其创作的目的和译介的取向相一致。从群体方面看，自从专业翻译家队伍形成后，翻译、创作一身二任的现象减少，但翻译与创作依然表现出同一性和互文性的关系。某一时期的文学发展动向、思潮成为文学翻译择取价值取向的依据。

① 郎损（沈雁冰）：《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2 号（1921 年 2 月 10 日）。

② 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新中国杂志社，1920 年。转引自《瞿秋白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年，第 248—249 页。

翻译和创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动本民族文学的发展。

从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作用来看,20世纪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所作的序言中指出翻译文学的三大作用:一、提高了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二、改变了文学语言;三、改变了小说的创作方法,引进了新的文学品种——戏剧。^①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中也指出:“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②施蛰存明确指出的是翻译文学的影响作用,陈平原所说的“域外小说”其实也是指翻译文学。学界常常提及外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在概念上常有模糊之处。人们常常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他们所说的“外国文学”,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指的是翻译文学。20世纪中国作家绝大多数是借助译本来认识外国文学的。外国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指翻译文学的影响。译者根据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在翻译选择时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为时代文学提供直接的文学支持和参照借鉴对象。这样,译作就具有了直接针对性。与原作相比,译作是由译者转化了的影响源文本。译作比原作产生的文学影响效应就更直接,更为显著。

以色列著名文化理论家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从翻译文学与译入语文学关系的角度,分析了翻译文学在译入语多元系统中的地位,指出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三种情况:一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发展初期;二是当译入语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当译

① 施蛰存:《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序》,上海书店,1990年。

②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入语文学出现危机或转型时期。^①从翻译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上看,这三种情况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翻译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转型、危机时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促进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转变,参与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翻译文学还被作为一种独特的力量用来推翻和摧毁旧的文学范式、文学观念以及种种对文学的桎梏,如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政治小说”翻译,借此推翻“综其大端,不出海盗海淫两端”^②的中国古典小说范式;再如20世纪80年代通过对欧美现代文学的大量翻译,挑战当时依然僵化的文学创作范式,促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

文学翻译的选择是以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为旨归,择取向度与文学的发展走向相契合,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历时性地构成同步对应关系,译作与创作相容而共生,异质而同构,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学的时空。

三、翻译文学史:内容与方法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翻译文学不仅仅是两种文字转换的结果。译作既是原作的“第二生命形态”,又是民族文学的一种新的分子,同时也是特定时代文化碰撞的记录。翻译文学进入民族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成为民族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当我们将文学翻译活动纳入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化语境中,将翻译文学与中国自身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发掘文学翻译与时代语境的联系;当我们厘清了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看清翻

^① Itamar Even-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in Holmes, Lambert & Broeck (eds.)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New Perspectives in Literary Studies*, Leuven, Belgium: Acco, 1978.

^② 任公(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论报》第1册,1898年,转引自陈平原、夏晓红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